



Intellectual Resonance in Times of Shared Crisis: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Modern Chinese Reformists and Anti-Colonial Intellectuals in Southeast Asia

HE Yang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March 11, 2026

Accepted: April 15, 2026

Published: June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HE Yang. (2026). Intellectual Resonance in Times of Shared Crisis: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Modern Chinese Reformists and Anti-Colonial Intellectuals in Southeast Asi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 030–03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0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2.005>

Abstract: From the mid-19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were both subjected to the shocks of Western colonial expansion. Driven by the common goal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urvival,” intellectuals from both regions engaged in cultural mutual assistance through channels such as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overseas studies, and folk networks, fostering a cross-regional and transnational resonance of anti-colonial though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reformists and anti-colonial intellectuals in Southeast Asia,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dissemination pathways, and practical impact of their intellectual resonance. It aims to reveal the unique value of cultural mutual assistance in modern anti-colonial struggles and provide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Modern China; Reformists; Southeast Asia; cultural mutual assistanc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HE Yang holds a PhD degree in World History.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Colleg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共同危機下的思想共振： 近代中國維新派與東南亞反殖知識份子的文化互助研究

何 楊

寧波大學科學技術學院

摘 要：19 世紀中葉至 20 世紀初，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同處西方殖民擴張的衝擊。在『救亡圖存』的共同訴求下，兩地有識之士通過報刊、留學、民間網路等管道展開文化互助，形成了跨區域國別的反殖思想共鳴。本文以中國維新派與東南亞反殖知識份子的互動為中心，探討其思想共鳴的歷史語境、傳播路徑與實踐影響，揭示文化互助在近代反殖鬥爭中的特殊價值，並為當代中國-東南亞國家文明互鑒提供歷史鏡鑒。

關鍵詞：近代；維新派；東南亞；文化互助

一、引言

19 世紀是西方殖民主義全球擴張的時代，也是亞洲文明劇烈轉型的時期。中國自鴉片戰爭起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東南亞國家則先後被荷蘭、法國、美國等國殖民統治。共同的殖民壓迫境遇催生了兩地知識份子『保種保教』『救亡圖存』的共同訴求，推動其突破地理與政治邊界，通過思想交流與文化互助探索反殖路徑。其中，中國近代維新派與東南亞反殖知識份子的互動，是這一進程中極具代表性的文化現象。

既有研究多聚焦於中國與東南亞的殖民經濟關係或政治博弈，對其文化互動的深度挖掘不足。本文以『文明互鑒』為視角，通過梳理維新派與東南亞反殖知識份子的思想共鳴，揭示近代亞洲文明在危機中的互助邏輯，為理解區域文明互動提供新的分析維度。

二、共同殖民危機：『救亡共識』的歷史語境

（一）殖民壓迫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殖民遭遇雖同屬『西方衝擊』，但具體形態存在顯著差異。中國自 1842 年被迫簽訂《南京條約》起，逐步喪失關稅自主權、司法裁判權與領土主權，至 1901 年《辛丑條約》簽訂，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強對中國殖民壓迫的核心是『制度性侵蝕』。在經濟層面，列強通過控制海關、壟斷航運與金融，將中國經濟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任海關總稅務司近半個世紀（1863-1908）。^①怡和、太古等英資輪船公司佔據長江航線 70% 以上份額，還獲得內河航行權。^②匯豐銀行發行紙幣流通於華南，並通過政治貸款控制清政府財政。^③而在文化層面，列強推行『基督教化』與『西學東漸』，動搖儒家文化的社會根基。據《教會新報》統計，1860 年至 1900 年間，新教傳教士在華建立教會學校 2000 餘所，學生超 4 萬人。^④同時，新式學堂課程全面採用西方學科分類，儒家經典課時壓縮至 15%。^⑤

東南亞國家的被殖民模式更具多樣性。荷蘭對荷屬東印度（今印尼）實行『種植園-壟斷貿易』體制，通



過『強迫種植制度』強制農民種植甘蔗、咖啡，剝奪本土經濟自主權；法國對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撾、柬埔寨）推行『同化政策』，廢除越南科舉考試，強制推行法語教育；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則以『軍事佔領-自治過渡』為特徵，通過『菲律賓人治菲律賓人』策略分化反抗力量。儘管形式各異，殖民統治的共同後果首先是本土王權瓦解。越南阮朝 1884 年《巴德諾條約》被迫承認法國『保護權』，君主淪為傀儡。印尼蘇門答臘亞齊蘇丹國 1903 年戰敗投降，到 1910 年全境蘇丹國消亡。其次是文化認同斷裂與傳統價值體系崩潰。菲律賓強行推行西班牙語，他加祿語書寫系統遭禁；而印尼『阿班甘文化』被荷蘭歸類為『低級迷信』，基督教傳教士系統性破壞聖地。

（二）思想資源的共通性：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聯結

面對殖民危機，兩地知識份子均從『傳統思想資源』與『西方啟蒙思想』中尋找救亡出路，形成跨區域國別的思想共鳴基礎。

1. 傳統思想的紐帶

傳統思想體系在東亞-東南亞區域的文化融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儒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與『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跨越地理疆域成為不同族群的倫理紐帶。在越南阮朝（1802-1945），儒家倫理被確立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支柱，以『三綱五常』為治國綱領。其科舉考試以《四書》《五經》為核心內容，使程朱理學成為精英階層的必修課。印尼華人社群雖受殖民壓迫，仍保留『耕讀傳家』傳統，通過宗族祠堂、私塾教育傳遞儒家倫理。這種文化堅守不僅塑造了社群凝聚力，更成為抵抗文化同化的精神堡壘。

佛教思想則為反殖民鬥爭提供了獨特的道德資源。『眾生平等』的哲學觀與『慈悲救世』的實踐精神，在兩地抵抗運動中轉化為革命動力。中國維新思想家譚嗣同在《仁學》中創造性轉化佛教『無我』觀，以此解構封建專制的精神枷鎖。印尼民族主義者在反抗荷蘭殖民統治時，巧妙運用佛教中反對壓迫的教義，將殖民者對寺廟徵收重稅的行為闡釋為對信仰自由的侵犯，有效動員了廣大信眾。

2. 西方啟蒙思想的共同吸收

西方啟蒙思想的跨區域傳播催生了變革共識。中日越菲知識份子通過譯介主動吸納進化論、民權思想等新知。嚴復譯介的《天演論》所宣揚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理論，深刻重塑了中國知識界的危機意識。^⑥越南愛國志士潘佩珠在 1907 年翻譯《哲學原理》時，系統引入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與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學說，為越南革新運動奠定理論基礎。^⑦菲律賓民族英雄何塞·黎薩爾在小說《不許犯我》中，通過伊拉加曼迪尼奧之口發出『自由與平等』的時代吶喊，其思想內核明顯承襲自法國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與人道關懷。^⑧這種對變革必要性的共同認知突破了『東西方對立』的思維桎梏。當康有為疾呼『能變則全，不變則亡』，潘佩珠宣導『適應時勢，革新救國』，黎薩爾警示『沉睡的民族終將被歷史淘汰』時，一條跨越文明界限的變革共識已然形成。正如史華茲所指：『19 世紀末東亞知識份子在回應西方挑戰時，展現出驚人的思想趨同性』^⑨，這種趨同性植根於對傳統價值的批判性繼承與對普世理性的開放態度。

三、思想傳播的管道：報刊、留學與民間網路

（一）報刊與出版

近代報刊作為新型資訊傳播媒介，構建了超越地理疆界的『文字同盟』，成為維新派與東盟反殖知識份子思想交鋒的核心場域。這種傳播不僅實現了政治理念的跨區域國別流動，更塑造了東亞知識份子共同的現代性想像空間。

1. 中國維新派報刊的東盟輻射

中國維新派報刊通過華僑網路形成對東南亞的知識滲透。《時務報》(1896—1898)作為維新運動的思想中樞,梁啟超主筆時期刊發的《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文,系統闡述『伸民權、設議院』的制度改革方案。該報通過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建立的發行網絡,在馬來亞各埠設立分銷點,據《叻報》廣告顯示,1897年南洋群島訂閱量達1200份。^⑩新加坡《叻報》主編葉季允在1897年10月社論中明確宣稱:『中國變法之成敗,實系東亞全局安危』^⑪,充分顯示出殖民地精英對中國改革的戰略關注。而在法屬印度支那的特殊語境下,《嘉定報》(1865—1908)作為殖民地唯一中文報刊,承擔著知識過濾與再傳播功能。該報選擇性轉載《飲冰室自由書》中《愛爾蘭獨立記》等篇目,將殖民地反抗納入全球民族主義敘事框架。這種『去語境化』處理雖削弱了原文的革命色彩,卻為越南知識界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反殖話語資源。

2. 東盟反殖刊物的反向輸入

東盟反殖刊物通過跨國出版網路實現知識流動。潘佩珠創辦的《南風雜誌》(1907—1908)以『恢復國粹』為旗號,批判法國殖民教育的『文化滅絕』政策,其《論漢喃文字之價值》一文被《新民叢報》第15號全文轉載。^⑫這種知識流動並非單向輸出,而是呈現出『中心—邊緣』互動特徵。正如梁啟超指出:『安南志士之憂患意識,恰為我輩前車之鑒』^⑬,體現出知識精英的跨文化反思。

前文提及的菲律賓民族英雄何塞·黎薩爾的中譯本著作《不許犯我》在中國知識界引發強烈反響。該書通過具體案例揭露西班牙殖民暴行,梁啟超在《新大陸遊記》中評價其為『東方民族主義的覺醒先聲』^⑭。值得注意的是,廣智書局作為維新派重要出版機構,其選題策劃明顯帶有政治考量,反映出知識傳播背後的權力博弈。

(二) 留學生與知識社群:『師徒—同窗』的雙向聯結

留學生群體作為『流動的知識階層』,構建起跨區域國別的『師徒—同窗』關係網絡,推動思想傳播從文本閱讀轉向實踐對話。這種雙向互動既包含制度借鑒,也涉及身份認同的重構過程。

1. 中國維新派的東盟人才吸納

維新派領袖通過海外活動建立跨國知識社群。康有為1901—1903年流亡北美期間,在溫哥華華僑社團中結識多位東南亞國家留學生,其《大同書》手稿曾在這些群體中傳閱。梁啟超1905年在東京主持『東亞青年會』時,專門設立『南洋支部』,吸引越南、印尼學生參與討論。潘佩珠1905年赴日考察期間,在日本橫濱與梁啟超進行的『徹夜長談』,被其寫入《越南亡國史》等文章,成為中越思想交流的重要見證。同時,知識轉移呈現制度化特徵。印尼留學生溫雄飛1906年進入兩湖書院後,系統學習維新派憲政理論,歸國後參與組建『印尼中華黨』,將『君主立憲』主張本土化為『有限自治』訴求。這種適應性轉化表明,思想傳播需經歷在地實踐的調適過程。

2. 東盟反殖領袖的中國經驗借鑒

東盟革命者主動來華尋求思想資源。潘佩珠1905年參與制定的《亞洲和親會宣言》,明確採納孫中山『驅逐帝國主義』的政治綱領,但其『大亞洲主義』構想又融入越南傳統夷夏觀。^⑮其著作《越南亡國史》直接模仿黃遵憲《日本國志》的體例結構,通過中日變革對比論證改革必要性,這種『以他者為鏡』的寫作策略,體現了後發國家知識份子的普遍焦慮。

(三) 秘密結社與民間網路:文化互助的『隱性通道』

民間組織的互通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殖民當局的資訊封鎖,構建起『去中心化』的反殖網路。他們主張隱蔽的傳播方式,依託傳統文化符號,實現政治動員與文化認同的有機結合。



1. 秘密會社的話語轉化

天地會在東南亞的分支機構創造性轉化中國傳統反清話語。越南洪順堂將『反清復明』口號改造為『抗法復國』,通過『斬白雞』盟誓儀式強化組織凝聚力。其傳唱的《反洋歌》保留天地會『官逼民反』的傳統母題,同時注入『抗捐抗稅』的現實訴求,形成獨特的反殖話語體系。1901年南圻起義中,起義軍使用的『大明旗』與天地會旗幟存在明顯譜系關聯,印證了秘密會社的組織延續性。

2. 佛教僧團的道德動員

佛教團體通過宗教網路進行反殖宣傳。太虛法師(1890—1947)與緬甸吳佩芒法師(1878—1952)的合作具有典型意義:1913年在仰光舉辦的『佛教救國大會』上,二人共同譴責殖民政府對寺廟財產的掠奪。^⑥這種『宗教-民族』雙重動員策略,將佛教戒律中的『護國』思想轉化為政治抵抗依據。據《海潮音》記載,會後三個月內緬甸佛教徒捐款支持反殖運動者增加三倍。^⑦泰國高僧佛使比丘(1906—1993)在《和平之路》^⑧中提出的『非暴力抵抗』理念,明顯受到中國佛教革新派的影響,這種跨國宗教對話為反殖運動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

四、思想共鳴的實踐:從『變法圖存』到『民族獨立』的理念互鑒

(一) 政治變革路徑的討論:改良與革命的碰撞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中國與東南亞反殖知識份子圍繞『變革路徑』展開激烈論爭,形成『君主立憲』與『暴力革命』兩種模式的理論對話與實踐互鑒。這種碰撞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在殖民壓迫背景下對『國家出路』的差異化探索,折射出兩地社會結構的深層差異。

1. 改良路徑的嘗試與局限:以『君主立憲』為中心

維新派提出的『君主立憲』主張,本質是主張保留傳統政治外殼,希冀引入西方憲政元素,以減少變革阻力。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1898—1912)與潘佩珠的通信中,明確提出『越南可效仿英國君主立憲,保留國王以減少殖民阻力』。^⑨這一建議被潘佩珠納入《越南維新策》的改革方案,主張『先設議院,後廢殖民』,試圖通過有限度的政治參與削弱法國殖民統治的合法性。^⑩然而,越南的殖民環境與中國存在顯著差異,法國殖民當局通過『分而治之』政策強化控制,1908年『安沛起義』的失敗表明,在殖民暴力高度集中的背景下,單純依賴議會改革難以撼動殖民體系。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則為君主立憲的實踐提供了反面鏡鑒。維新派試圖通過光緒帝推行『百日維新』,但缺乏軍事支持與社會基礎,最終被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扼殺。這一事件證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結構中,若無法突破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枷鎖,『君主立憲』只能成為空中樓閣。

2. 革命路徑的借鑒與調適:以『民族革命』為旗幟

東南亞國家反殖運動的『暴力革命』經驗為中國革命派提供了重要參照。菲律賓黎薩爾領導的『卡蒂普南起義』(Katipunan Revolt, 1896—1898)雖未成功,但其『武裝反抗殖民統治』的主張深刻影響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孫中山在《革命方略》中明確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列為首要目標,並在《建國方略》中坦言:『菲律賓之獨立運動,予吾人以極大之教訓——殖民統治必以武力打破,方有真正之解放。』^⑪這種對『暴力革命』的肯定,突破了維新派『改良優於革命』的思維定式。

然而,革命路徑的選擇亦需結合本土實際。康有為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中批評革命派『不知種族革命之害,將使中國糜爛』^⑫,認為暴力會破壞社會秩序,導致列強瓜分。這種分歧的本質在於兩地殖民化程度的不同:中國當時處於『半殖民地』狀態,尚有通過改良爭取自主空間;而越

南、菲律賓等國已被直接殖民統治，殖民當局通過軍事佔領、經濟掠奪與文化同化徹底摧毀了傳統社會結構，故革命成為更現實的選項。²³

（二）文化主體性的建構：『保教』與『保種』的共通邏輯

面對殖民文化的侵蝕，兩地知識份子不約而同地將文化認同作為反殖鬥爭的精神武器，形成『保教』與『保種』的共通邏輯。這種努力不僅是文化傳承的需要，更是對殖民主義『文化滅絕』政策的直接回應。

1. 『保教』與『保種』：文化認同的雙重維度

中國維新派以『孔教救國』為核心，試圖通過重構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抵禦殖民意識形態。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二書》中提出『孔教為國民精神之本』，主張將儒學定為『國教』，並參照基督教模式建立全國性教會組織。²⁴他認為：『泰西之所以富強者，不在炮械軍兵，而在窮理勸學……中國數千年文明之教，實足以救今日之弊。』²⁵這種『文化救國論』本質上是通過啟動傳統文化以凝聚反殖共識。東南亞國家知識份子則更強調『語言獨立』與『民族意識覺醒』。潘佩珠在《越南亡國史》中痛斥法國殖民當局『欲滅其國，先滅其文』，批判強制推行法語教育的政策破壞了越南的文化傳承。²⁶為此，他發起『國語運動』，推廣拉丁化的越南語，主張『語言獨立是民族獨立之基』。²⁷印尼民族主義領袖迪爾托·蘇庫爾托提出『傳統習俗現代化』，主張保留『蘇丹制』作為文化符號，但限制其政治權力，同時在基層引入現代行政體系。這種『選擇性繼承』策略，體現了反殖知識份子對『文化主體性』的辯證理解——既反對全盤西化，也拒絕復古倒退。

2. 傳統與現代的調和

在應對現代性挑戰時，兩地知識份子均採取了『在傳統框架內引入現代性』的折衷策略。中國洋務派提出的『中體西用』被維新派發展為『中西會通』，即在保留傳統制度（如科舉、宗法）的同時引入西方技術與思想。例如，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主張『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試圖通過教育改革調和傳統倫理與現代科學。²⁸東南亞知識份子的實踐同樣體現了這一思路。緬甸昂山（Aung San）在領導獨立運動時提出『緬甸式社會主義』，主張保留佛教文化的主導地位，同時借鑒蘇聯計劃經濟模式。這種『傳統與現代的平衡』，反映了反殖知識份子對『變革限度』的清醒認知，認為過度激進可能導致社會失序，而固守傳統則無法應對殖民主義的衝擊。

五、歷史影響與局限性

（一）對兩地反殖實踐的推動

維新派與東南亞國家反殖知識份子的文化互助，不僅提供了思想資源，更推動了反殖運動的國際化與組織化，形成了東亞-東南亞反殖網路的雛形。

中國維新派的『君主立憲』主張為東盟反殖提供了『非暴力改良』的參考路徑，而東南亞反殖的『激進抗爭』經驗則為中國革命派提供了『暴力革命』的另一種選擇。這種雙向借鑒打破了『東方主義』話語下的文明等級論，證明不同社會背景的反殖力量可以通過思想交流找到適合自身的道路。文化互助的直接成果是反殖運動的跨國聯合。1905年，由孫中山、黃興、潘佩珠等發起的『亞洲和親會』，明確將『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作為共同綱領，會員涵蓋中、越、菲、印等國志士。該組織在上海、東京、河內設立分支機構，通過出版《民報》、舉辦演講會等方式，推動反殖思想的跨國傳播。《民報》曾連載潘佩珠的《越南亡國史》，引發中國知識界對越南問題的廣泛關注。²⁹這種『思想共鳴』向『組織聯合』的跨越，標誌著東亞-東南亞反殖力量開始形成協同作戰的意識。



（二）歷史局限性分析

儘管文化互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影響仍受限於殖民當局的壓制、內部矛盾的分化與文化傳統的制約,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反殖運動的分散狀態。

殖民當局通過嚴格的文化審查與暴力手段遏制反殖思想的傳播。法國殖民政府對越南反殖刊物《南風雜誌》(Nam Phong Magazine)的查禁、清朝海關對《越南亡國史》等書籍的扣押,嚴重限制了思想傳播的廣度與深度。此外,殖民當局還通過『分而治之』政策挑撥各地反殖力量關係,例如法國在越南扶持保皇派對抗革命派,加劇了內部矛盾。^③

此外,兩地反殖力量均存在嚴重的內部分裂。中國維新派內部『保皇』與『革命』的決裂、東南亞反殖力量的碎片化(如越南保皇派與革命派的鬥爭、印尼伊斯蘭教派與世俗民族主義的衝突),使互助難以形成合力。這種分化本質上是不同階層、地域利益訴求的衝突:維新派代表士紳階層的改良訴求,革命派反映新興資產階級的激進主張;東南亞國家保皇派試圖借助傳統權威恢復君主制,革命派則主張徹底推翻殖民統治。

文化傳統對變革路徑的選擇產生了深遠影響。儒家『忠君』思想使部分東南亞知識份子對君主立憲抱有幻想,例如潘佩珠後期轉向支持阮朝復辟,認為『君主立憲仍是過渡時期的必要選擇』^④。中國『天下中心』的傳統觀念則導致對東南亞反殖經驗的忽視,例如維新派未充分吸收菲律賓革命經驗,仍將『中學為體』視為不可動搖的原則。這種認知偏差反映了固有思想對現代反殖意識的束縛,使得兩地知識份子難以完全超越自身的歷史局限性。

六、當代啟示

近代東亞與東南亞知識份子在殖民危機中的文化互助實踐,不僅揭示了文明交往的內在規律,更為當代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提供了超越時空的經驗鏡鑒。

（一）『共同歷史記憶』對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價值

近代反殖互助史構成了中國與東南亞共用的『集體創傷記憶』(Collective Traumatic Memory)。這種記憶並非簡單的歷史事件複現,而是通過『共患難』的情感根基,形成了跨越國界的身份聯結。根據阿斯曼(Jan Assmann)的文化記憶理論,集體記憶通過儀式化實踐被不斷啟動,成為維繫群體認同的黏合劑。2023年中國-東盟文化遺產周的實踐活動,如中越聯合修復『友誼關』、中印尼合作整理『海上絲綢之路』文獻等,正是通過具象化的歷史符號再生產,將抽象的『反殖精神』轉化為可感知的文化資本,為化解南海爭端等現實矛盾提供了情感緩衝。

進一步而言,這種記憶的政治價值在於其去等級化的敘事特質。不同於殖民時期『文明等級論』的話語霸權,近代互助史呈現的是平等主體間的互助協作。這為當代區域治理提供了重要啟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需超越『中心-邊緣』的傳統認知框架,通過共同歷史記憶的挖掘與闡釋,構建『責任共擔、利益共用』的新型區域認同。

（二）文化交流的『雙向性』與『本土性』原則

歷史經驗表明,有效的文明互鑒絕非單向度的文化輸出,而是基於雙方主體需求的雙向意義建構(Bidirectional Meaning-making)。這種建構遵循兩大原則:其一,問題導向的共同性,即交流需圍繞雙方共同關切的現實議題;其二,本土主體性的堅守,即尊重不同文明的具體實踐,避免以單一文明標準裁剪多元

實踐。以中國-東盟影視合作為例,《流浪地球 2》在東南亞市場取得 18% 的票房占比,其成功在於影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與東盟『區域共同體』建設的訴求形成價值共振。這恰恰印證了霍爾(Stuart Hall)的編碼/解碼理論:文化傳播的效果取決於接收方能否在自身文化框架內完成意義的再生產。反之,若忽視本土語境,則可能導致『文化誤讀』。因此,當代合作需確保文化交流能夠『雙向奔赴』。

(三) 青年與民間網路的作用

近代反殖互助的實踐主體多為青年知識份子與民間團體,其跨區域流動構建了非正式的知識傳播網路。這些網路具有去中心化、高滲透性的特點,能夠突破官方外交的層級限制,在草根層面培育互信基礎。當代青年交流專案的設計可從中汲取靈感。2024 年中國-東盟青年非遺論壇中,越南水上木偶戲與中國皮影戲的聯合展演,正是通過青年藝術家的跨界協作,實現了傳統技藝的『創造性轉化』。這類實踐表明,民間網路的價值不僅在於資訊傳遞,更在於實踐共同體的培育——當青年群體在共同的非遺保護、環保行動中產生情感共鳴與價值共識,便能為區域合作注入持久的內生動力。未來需進一步擴大民間組織的參與空間,如設立『中國-東盟青年創新基金』,推動學術交流、藝術共創與社會服務的深度融合。

七、結論

近代中國維新派與東盟反殖知識份子的文化互助,本質上是一場共同危機驅動下的文明對話實踐。它打破了『西方中心論』預設的文明衝突敘事,證明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通過平等協商實現共同發展。其歷史經驗可凝練為三重範式啟示:以共同歷史記憶消解認同隔閡,以雙向建構原則超越文化霸權,以青年網路啟動代際活力。

當代中國-東盟合作正處於從『功能性互補』向『價值性認同』升級的關鍵階段。唯有以史為鑒,在尊重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上構建『雙向互動、本土適配、青年主導』的交流機制,才能將『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從理念轉化為實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探索貢獻亞洲智慧。這一過程不僅是區域合作的深化,更是對『文明何以共生』這一永恆命題的時代回應——真正的文明互鑒,從來不是優績主義的競賽,而是不同文明在相互照亮中實現的精神成長。

注釋

- ① 萊特(著),姚曾廣(譯):《中國關稅沿革史:1843-1938》,北京:商務印書館 2023 年版,頁 1-217。
- ②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版,頁 1-89。
- ③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2025 年版,頁 200-386。
- ④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頁 156。
- ⑤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5 年版,頁 73。
- ⑥ 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科學出版社 1971 年版,頁 1-98。
- ⑦ David G. M. (1971).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1925*.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⑧⑩ Benedict A.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 ⑨ Benjamin S. (1964).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⑩ 《叻報》1897 年 10 月 12 日,廣告欄。
- ⑪ 葉季允:《論中國變法與東亞大局》,《叻報》1897 年 10 月 15 日,社論。
- ⑫ 潘佩珠:《論漢喃文字之價值》,《南風雜誌》1907 年第 5 期;《新民叢報》1907 年第 15 號轉載。
- ⑬ 梁啟超:《讀〈南風雜誌〉感言》,《新民叢報》,1907 年第 16 號,按語。



- ⑭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橫濱:新民叢報社 1903 年版,頁 87。
- ⑮ 潘佩珠:《亞洲和親會宣言》,《越南亡國史》,東京:1905 年東京版,附錄。
- ⑯ 太虛:《太虛大師全書》,善導寺佛經流通處,1946 年,第 32 冊第 15 頁。
- ⑰ 太虛:《聽太虛法師在光孝寺維摩詰經雜錄九則》,《海潮音》1924 年第 5 卷第 8 期。
- ⑱ 佛使比丘:《和平之路》,曼谷:曼谷佛教協會,1969 年,第 78 頁。
- ⑲⑳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頁 45-112。
- ㉑㉒㉓㉔ 潘佩珠:《越南維新策》,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 年版,頁 45-89+28。
- ㉕ 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 2011 年版,頁 156。
- ㉖㉗㉘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版,頁 32-234。
- ㉙ 參見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 年版,頁 215。
- ㉚ 桑兵:《日本東亞同文會廣東支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1 期,頁 117。
- ㉛ 陳輝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一卷)》,北京:三聯書店 2010 年版,頁 112。

(Editors: Derrick MI & Andy ZHANG)